

● 社会学

新经济浪潮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双重转型^{*}

殷 燕 敏

(武汉大学 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殷燕敏(1956-), 男, 江苏无锡人, 武汉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

[摘 要] 新经济崛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在新经济推动下, 新一轮社会转型浪潮席卷全球, 以传统农业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同时面临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向以新经济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的双重转型。把新经济引入中国乡土社会, 则必须重新对新经济浪潮做出社会认定, 对新经济崛起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做出历史定位, 以保证在新经济浪潮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良性运行。

[关键词] 新经济浪潮; 乡土社会; 结构转型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28(2003)03-0380-05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随着新的经济社会实践——“新经济”在美国的出现, 世界正发生着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 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乃至价值观, 这就是知识经济在全球的兴起。新的社会实践必然带来新的理论视角, 从新的角度去审视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无疑是适应时代的需要, 它将对中国现代化产生重大影响。

—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新经济”在美国的兴起以及它给世界带来的强大震撼。

“新经济”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商业周刊》(1996 年 12 月 30 日), 意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信息技术(IT)革命及其高新科技产业, 其主要特点是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低财政赤字、高经济增长等。美国经济自 1991 年 3 月以来运行状态极佳: 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低失业、低通货膨胀、联邦财政赤字不断下降且略有盈余, 股市不断攀升, 资本投资一派兴旺。面对这一情况, 许多学者从全新角度和更深层次上去思考, “新经济”是否已改变了美国经济的本质, 产生出一种区别于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经济形态。

以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荷尔斯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史蒂文·韦伯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主编朱克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学派认为,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以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通信和网络技术、软件和系统集成技术等高新科技产业为先导的产业革命已使美国经济进入信息经济时代, 工业化生产方式正在被信息化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信息技术惊人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是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 它改变了美国经济传统的本质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范式。首先, 从经济的增

长方式上看,由于信息技术已广泛渗透到传统工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为传统工业注入前所未有的新鲜活力,致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推动国民经济长时间高速增长。随着信息技术向更深层次的渗透,由其孕育的工业生产创新和革命还在不断涌现,它们成为推动经济源源不断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其次,从经济增长的源头看,传统的资本、劳动力都不足以支持经济长时间强劲发展,只有电脑网络信息技术才能承担起推动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的重任,并能够在短时间内创造出大量社会财富,如迅速崛起的微软公司就是信息技术创造巨额财富的典型。有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5年里,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有1/4来自信息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每年增长40%,产值占整个制造业的25%。当今美国电脑产业每年创造的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信息业及相关服务业占美国GNP的30%左右。在信息产业推动下,美国社会已率先进入高技术产业化的信息社会^[1](第277-278页)。

但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克鲁格曼和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菟原综一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却认为,“新经济”并没有使美国经济发生本质的变化,计算机革命并没有促成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也未显示出此种经济与以前有什么根本性的新变化和新特征。目前,谈论计算机革命引发的实际经济效益为时尚早,因为从历史上看,在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和生产力大幅提高之间常常有一个较长的时间间隔。例如,可供实用的发电机、电动机及内燃机相继出现于19世纪70至80年代,但企业懂得如何合理应用这些新动力来组织生产,提高生产效率,时间竟隔了40多年。同样,尽管微电子技术(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为代表)问世大约有近30年,但许多企业目前还停留在使用新技术的启蒙阶段,尚难看出信息技术革命对提高全社会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明显作用^[1](第277-278页)。

尽管经济学家们对“新经济”是否改变了美国经济的本质乃至世界经济的本质看法上存在分歧,但若站在社会学角度来看,“新经济”已经给人们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仍在延续并向社会更深层次扩展。社会已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新经济”达成共识:(1)“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初露端倪,许多知识经济规律已经开始起作用,信息社会的概念正日益深入人心,高新技术产业正获得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传统产业的高科技含量也日益增加;(2)“新经济”受到与300年前工业经济出现时截然不同的社会待遇。300年前工业经济出现时,除了欧洲积极扶持并将其带到美洲以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则无从涉及,从而酿成了150年后这些地区贫穷落后的历史悲剧;而今天,全世界的有识之士无不对“新经济”的出现高度重视,并开始在指导思想、组织机构、人才选拔、资源投入等方面积极迅速地作出回应,渴望迎头赶上这轮浪潮;(3)像300年前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时期工厂的大量出现一样,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广泛出现了代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科技工业园区,它们迅猛的发展势头以及迅速壮大的经济实力,显示出知识经济的新型细胞已经出现并迅速发展壮大,世界已进入新经济淘汰旧经济的时代。

二

新经济的崛起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它带来了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使人们看到了知识经济社会来临的曙光。但也应看到,就像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一样,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变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正面临的转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什么东西是转型本身就具有的?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要遇到的?什么东西是不惜代价要保留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经济背景下对其历史定位进行新的思考。

(一)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土地资源和血缘家庭相结合,经历缓慢平衡发展而形成的农耕经济、农耕政治、农耕文化“三位一体”的稳定社会结构,它的转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程发生和进展的,应该说是一个被延误的历史进程。综观世界发展史,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和民族要想完成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必须经历两个阶段:(1)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统一,建立主权国家,这是为转型创造前提条件的时期。(2)进行产业革命,发展工业经济,实现工业化,是转型的发展时期。

1861年至1949年的88年时间,虽然西方工业经济开始逐渐影响中国社会,但由于同时伴随着殖

民主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无法发生,中国社会的根本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结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状。所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结构仍处于“低度发展”状态和创造转型前提条件的时期^[2](第 26-27 页)。

1949 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废除了几千年以来的土地私有制,中国已经具备了独立自主发展工业经济、改革农业经济、推进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前提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工作重心曾一度出现偏差,经济工作从属于政治工作,致使我国工业经济发展走了弯路。但是,在一系列不合国情的政策和路线指导下,形成了两个畸形儿:一个是与计划经济配套的计划社会体制,乡土社会被整体纳入了计划社会;另一个则是在严格的城乡管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由此,乡土社会无法得到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资源,致使农耕自然经济和乡土社会结构转型陷于停滞并走向僵化。乡土社会结构形式上虽有很大的变化,但实质上并未取得根本性的改观。

1979 年中国农村率先进行了改革,乡土社会结构转型也开始出现了重大转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产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而使农民第一次在土地之外寻求生存与发展。而城乡二元体制的突破,又为农民流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乡镇企业的崛起使农民开始尝试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同时促进了工业经济在农村的发展和推进。农民进城、乡村工业和各种非农产业的兴起,使得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建立起紧密的市场联系,中国农耕经济开始接受工业经济的革命性改造,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赖以生存和延续的根基开始动摇。

综上所述,处在全球“新经济”浪潮下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其实是一个被延误的历史进程,它造成了我们目前面临着的艰巨的双重转型任务,必须认清这一点,采取措施加快转型速度,甚至可以跳过某些常规环节,才能迎头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二)工业化是一种全球进程。工业生产力天生有一种扩张的本性,与此相伴的工业文明同样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工业生产力走到哪里,就把工业文明带到哪里,而这种文明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总要和原有的文明体系发生冲突,从而引发全球此起彼伏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是在这种全球现代化进程中起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该进程并影响这个进程。

1. 对于乡土社会结构转型而言,其面临的最大问题无疑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即实现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从 15 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看,人类社会存在一种事实上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早发内生型国家,还是迟发外生型国家,都面临或正面临着一些由现代化引发的、表现方式各异但本质相同的基本问题,如工业化的道路选择问题、现代性特征出现的问题等。而且,现代化进程虽始于早发的西方国家,也存在于迟发的东方国家;虽产生于资本主义体制,也共生于社会主义或混合经济体制。现代化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和特权,而是一个全球推进的过程。一些非常特殊的国家和地区也许不会出现现代化,但就全球意义来说,所有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转型都是现代化所致。所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存在现代化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与这种全球进程的现代化发生什么关系。一旦这个国家进入到这个全球进程中,其社会结构就会向现代化方向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新经济已使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但对乡土社会结构转型而言,目前最紧迫的任务仍然是完成农村工业化的任务,实现由传统的农耕经济向现代化工业经济的转变。

2. 现在的时代是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中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而存在。“新经济”是一个时代的规定性,中国不可能不受这个时代规定性的限制,因而,由新经济带来的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无疑也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所追求的后现代社会也是我们所要追求的。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如果对此视而不见,那么等到乡土社会实现了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或许早已进入了新经济时代,中国乡土社会将会成为中国社会落后于世界发展进程的最大包袱。

所以,在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全球推进中,在“新经济”背景下,转型不再是单纯的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应是一种“双重转型”:即把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大发展过程浓缩起来,合二为一,不但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同时还实现由工业社会向新经济社会转变。与之相适应的是,“双重转型”带来“双重任务”,即一方面要继续完成农村工业化的任务,另一方面又要

迎接“新经济”浪潮，这个过程将是极其复杂和艰难的。

(三)世界新经济的出现给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和问题，这使我们不得不把西方发达国家当初走过的漫长道路浓缩在一个较短的过程中，不得不把贫困问题、发展问题、生态问题、民主问题以及价值观念问题等历时态问题放在共时态中予以一次性解决，实现“双重转型”。这无疑具有极大的困难，但特殊的困难也有特殊的优势。

1.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乡土社会结构提供了全新的转型方式，为我们成功实现双重转型提供了先进的制度支持，这种支持突出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开放的自主转型。自主权是一个社会结构成功转型的决定性前提。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模式的主动选择和在全球推进中的积极吸收。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两难困境，即：一方面不对外开放就没有出路，就不可能实现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又必然使自己在世界经济体系和经济分工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包括受国际资本的剥削，依附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丧失传统文化并引起全方位“西化”。第三世界的“依附理论”集中反映了这种两难困境，并作出了闭关锁国以摆脱依附的错误论断。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为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走出这种两难困境选择了正确方向：联系于这个世界但不依附于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经过长期探索并总结经验教训而形成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它具有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优越性，具有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平衡和协调能力，很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对市场经济弊端的及时矫治能力。

2. 中国是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同早发内生型的发达国家相比，乡土社会结构转型具有不少潜在的后发优势。吴忠民教授把这些潜在的后发优势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取必要的参照与借鉴；(2)可以把外在的经济压力转化为一种强劲的动力；(3)可以吸引一定量的外资，以弥补现代化建设中资金的短缺；(4)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以提高本国的技术基础；(5)有利于现代人才的培养和借鉴许多有益的技术性的规章制度^[3]（第164页）。而且，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是一个以物质积累为主的过程，需要大量和长时间的资金、设备的投入，刚性很大，故这个变化的跃进很难。而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经济社会，由于知识的软性使其流动速度很快，只要知识的落差较大，就会使其流动速度加快，其变化的跃进也会相应容易一些。

三

在新经济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定位是这样的：一个被延误的、在复杂的全球进程中艰难推进的、具有特殊优势的双重转型。这一特殊定位无疑给我们提出了极富挑战性的任务，如果把握不好，势必增加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难度并可能将其引入歧途。因此，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良性运行的基本点就在于：

(一)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转型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领域的变革，如果我们任其盲目的、自发的、被动的向前发展，很难想像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无序状态会出现什么社会后果，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其社会变革是自上而下的，处于下面的“大众阶层”需要上面“精英阶层”的正确引导，因而，变革权威的确立是必需的。在中国，这一变革权威的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8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先进性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对全国各族人民具有极大的凝聚力，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具备了充当变革权威的能力。确立中国共产党变革权威的地位，是新经济浪潮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顺利实现双重转型的重要保障。

(二)新经济的崛起使知识经济社会浮出水面，这一世界潮流迫使乡土社会结构不得不接受双重转型。但是，知识经济不是一种具体的技术，而是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综合结果，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的支撑。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讲：“社会方面的创新远比蒸汽机或电报更为重要……要成长和繁荣，需要文化上的根。”^[4]（第32页）在乡土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型过程中，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观念正面临挑战，而西方价值观念又不能完全涵盖和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因此

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将诸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为人民服务与拜金主义、无私奉献与功利主义、勤俭朴素与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念进行创造性的整合,经过碰撞、吸收、融合、创新等一系列过程,形成能够支撑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整套新型文化价值体系。如果忽视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培育,片面为赶潮流而追求几个代表知识经济社会到来的主要经济社会指标的完成,结果很可能会欲速而不达。为“转型”而“转型”,忽视转型土壤的培育,乡土社会结构的转型结果可能又会演变出一个新的畸形儿。

(三)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成功实现无疑需要转型功能的发动。这种转型功能发动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型内生力的开发。所谓转型内生力是指社会系统由外在压力驱动的社会转型经过初始阶段,取得初步成果后,会从系统内部产生主动要求全面加速转型的推动力。在新经济背景下,中国乡土社会结构要想成功实现双重转型,就必须大力开发转型的内生力,不断地将外部压力和挑战转化为内在的发展动力,努力培养起发自社会系统内部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推动力。可以预计,随着这种内生力不断的发展壮大,农耕经济变革的速度便会逐渐加快,乡土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型也就愈能良性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田作高. 全球关注的美国“新经济”论[A].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C].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 [2] 吴忠民. 中国社会发展论[M]. 长沙:湖南出版社, 1988.
- [3] 吴忠民. 中国现代化:进入内在生长力的初步发育期[A]. 中国社会现代化[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4] [美]彼得·德鲁克.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M]. 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1989.

(责任编辑 于华东)

New Economy Tide & China Rural Society Transition

YIN Yan-min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YIN Yan-min (1956-), male, Lecturer,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sociology.

Abstract: *New economy* has been arising in the U.S.A. Accelerated by *new economy*, new tide of social transition has been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new economy tide, China social structure, which bases o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y, confronts dual social transition, from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and industrial society to post-industrial society led by new economy. This paper focuses on new economy and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rural China and elaborates three important topic, as follow, 1. Social identification of new economy tide, 2. The spring of new economy and historical orientations of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rural China, 3. The basic points of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rural China positive operation in the new economy.

Key words: new economy tide; rural society; structural transition